

第十章

叙述者

现在我还经常对我孙女子说，婆那时最可怜了……（那时）剩一点饭啦，剩点焦锅巴，都舍不得摔了，都弄开水泡到喔，淘尽了搭点菜煮到吃了，你们现在这，早晨剩的挺白的饭，“婆，扔了，喔没法吃！”你说是晚上或过一天不能吃，早晨才剩的饭嘛“喔咋能吃？婆，吃了把人肚子拉坏了咋办呀？”话也说的是实，可是我们五十年代的人过的那些日子恼火的啥一样的。我们老汉经常说我：你龟儿呀，得哟啥时把你饿死了投的胎？就是那话一颗粮食你细米的没法。¹

老年妇女从当下的制高点回望自己的青少年和中年。社会性别塑造了她们的寿命、自我理解和经济上的脆弱，就如同社会性别曾在集体化时期塑造了她们的劳动生活一样。她们强调自己的固有美德、最重要的功绩和深藏于心底的怨恨。每个故事都是一个说法，一种阐释，不仅经过了记忆、忘却和细节重组的编码组合，还经过了节奏、重点和声调的加工调试。这些都是我们的文本所无法完整再现的。老人们对自己的说法深信不疑并对它们进行了精雕细琢，但却又都是在某个特定时刻为某些特定聆听者而发。诸多不同的因素都会影响这些说法的形成，比如访谈者是谁，受访妇女对青年时代记忆的清晰程度，访谈者所提出的问题及想要听到的回答，老年受访者当时的心情以及她想象中的家庭和社群听众。

还可以听到那些故事的时刻就快要结束。张秋香于 2000 年去世，山秀珍逝于 2006 年，²曹竹香逝于 2008 年。当我在 2004 年返回 G 村再去采访乔引娣时，她已患了中风，基本无法说话。第五章开篇所提到的便是她在 20 世纪 50 年代搭车去新疆的故事。几个村庄的妇女都在缝制她们的寿衣或准备棺槨。但她们暂时还能说话。

她们关于青年时期的记忆和革命的记忆缠绕在一起。甚至那些记错了集体化的不同阶段或给政府发动的主要运动重新取了名字的妇女，通常都对 50 年代初的一些时刻有生动的记忆。她们记得歌唱自主婚姻的时刻，表演地方戏的时刻，或在秋收的时候挨家挨户地动员她们的邻居去加夜班扬谷的时刻。她们将最初的革命时刻记忆成是讲述她们自己的热情和发现自身可能性的地方。

那个最初的革命时刻之后常常紧接着的是对数十年的模糊记忆。在这几十年间，政治变革被新兴家庭的需求所遮盖，革命虽然从未受到批判，却不再同不断扩大的可能性联系在一起。她们记忆起自己持续“恹惶”和不断被家务活及贫穷压垮的状态，在面对懒惰的公婆挑战自己耐心时仍能维持家庭和谐的能耐，辛劳工作和有效地利用稀少的家庭资源的能力。这些都是她们记忆的自己的美德，但她们经常发现，自己的孩子或孙辈们既不了解她们的成就，也不可能在这些事情上胜过她们。

¹ 与杨安秀的访谈，1997 年。

² 渭南党建网发布了一条题为“劳动模山秀珍”的讣告。

农村妇女的记忆带有明显的社会性别特征和指向，但并都不是同一种意义上的特征和指向。劳模们追忆起她们对建设社会主义、尤其是在领导妇女植棉方面作出的贡献。前妇女主任们记忆起动员妇女去田里劳动的艰难过程，以及后来解释和贯彻不受大众欢迎的控制生育政策的艰辛。普通的农村妇女们讲述自己过去时则把家庭放在中心位置。在她们的故事中，家务活得到了应有的重视，而令人愕然的是，大部分有关集体化时期的官方文件却并未提及这些家务活。

最终，这些老年（通常守寡）妇女对当下的讲述，表明了再一次改变了农村的、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改革的反讽和矛盾之处。国家的干部宣称他们犯了一个错误——在农村推行公有制进行得太快并且过了头，从 80 年代初期开始，他们主张回到一种建立在土地可长期租用、可继承、但并不为私人所有，并废除大部分集体化特征的基础上的家庭式农业生产。这项举措产生的结果矛盾而复杂：农村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农村的年轻人大规模涌向城市，农村的土地为工业所侵占，地区与地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不平等兴起。

这些农村妇女们在一个繁荣程度和不安全感都不断增加的时代步入老年。在某些方面，她们的故事展现出明显的乐观态度。她们对 1982 年后重塑了农村地区的经济改革的许多方面表示称赞，³ 不厌其详地叙述物质生活如何比 50 年代的要好得多。她们并不为集体的消失而感到遗憾。但她们也没有批判集体。当妇女们回忆集体劳动时，她们回顾的是自集体化结束后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集体化时期试验的失败，许多人对试验引起的多年生活水平每况愈下的不满，现在都沉寂了。人们不再对集体化时期进行清算，并且如果说集体化的运作细节曾经对她们来说重要，现在也已不再重要了。很多妇女讲述的都是一个“生活两次变得更好”的故事，一次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另一次是在 80 年代。在这个故事中，集体化和去集体化彼此不矛盾；两者都是进步。虽然这些妇女们叙述的事件表明，自 1949 年以来官方的所作所为极为混乱和不连贯，但是她们讲述了一个总体物质水平得到提高的故事。

然而，集体的消亡和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巨变在农村的老年妇女身上留下令人不安的记号。她们在巨大的冷漠面前跟我们对话，并通过我们跟其他人对话。

中国宪法规定子女要赡养年迈的父母，禁止虐待老人。⁴ 然而，当前改革时期的经济压力以及数十年来家庭结构的变化，都削弱了老人的地位。随着她们的子女结婚、组建新家庭、在竞争不断增强的市场上打拼且不一定能成功，这些老年妇女中的一些被忽视、甚至被虐待，这在集体化时期很可能——我们不敢十分肯定——是无法被接受的。

一直以来，孝顺的儿媳都是确保农村老人能够得到照顾的关键人物。50、60 年代结婚的妇女大体上延续了这一角色。当她们讲述起那些年的时候，她们

³ 以下学者对农村改革进行了十分有益的讨论：柯丹青(Kelliher)1992 年；杰华 (Jacka) 1997 年；刘新 2000 年；熊景明 2000 年；齐新 (音) 1999 年；曹锦清 2003 年；蒋泽先 2005 年；陈桂棣和吴春桃 2006 年；高小贤 2006 年之二。

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 年)第四十九条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http://www.usconstitution.net/china.html#Article49>)。1998 年和 1993 年的宪法修正案依然保留了这些条款。

为公婆提供的照顾依然对她们叙述一个具有美好品德的自我至关重要。但现在到了她们去享受当婆婆的好处的时候——获得尊敬和得到物质上的支持——社会的期望却变了。她们的儿媳和儿子们更喜欢夫妻俩住在一起、组建一个富裕的“小家庭”，而不喜欢住在一个需要照顾老人的大家庭里。许多年老的妇女都是寡妇，“一个人吃饭”——即只负责自己家里开销——的情况十分显著。很多时候她们只能偶尔从儿子、尤其是那些经济上有困难的儿子那里得到一点物质支持，但这种支持往往不够，或者干脆没有。即便她们和儿子们都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她们还是得自己照料自己。试图通过再婚以重建一个新家的年老寡妇和鳏夫们会发现，他们的婚事遭到害怕家里财产会因此而减少的成年子女的反对。尽管很多年老的妇女都同意当下的物质产品变得相对充裕，但她们也认为，当地的贫困状况和不断变化的家庭价值观念限制了她们去获得这些产品。

她们关于 50 年代的故事里并没有表现出对自己年老体衰的悲悯或哀怜之情，⁵ 而是表达出对家庭成员和社会的抗议。社会曾倚赖并且要求她们付出大量的劳动、却普遍未认可这些劳动，而现在又逐渐将她们视为负担。这些故事提醒我们，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仅依靠了妇女在棉田里所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还依靠了她们被全盘遮蔽了的家务劳动。它们表明，正如社会主义带有深刻的社会性别特征和指向一样，对社会主义的多层变革、困难和意义的记忆也是如此。

本章探究年迈的农村妇女所共同持有的进步叙事，在这种叙事中，她们塑造了一个英勇且有美德的过去以挽回被贬低了的当下。本章亦探索改革开放时期家庭领域新如何成为新的显性存在。家庭领域不再是一个无偿劳动的场所。在改革时期一次并不怎么成功的变革中，家庭领域成了一个使许多老年妇女边缘化的所在。此终章讲述妇女们叙述的关于新近过去的故事，突出她们继续为自己要求一席之地而不断作出的努力。

进步

如妇女们所讲述的那样，1949 年革命带来了新的可能性。这些新的可能性不是通过改变妇女每天所做的工作得以实现，因为妇女一直都做这些工作。它们甚至不是通过抨击旧习俗得到实现：守寡守节只会使像曹竹香这样的新兴领导赢得尊敬。革命改变的是农村妇女工作的环境，消除了一些对安全和生计构成的最恶劣的威胁：征兵和流寇。革命减缓了长期食物匮乏带来的影响，在农闲时

⁵ 此章的重点并非妇女身体上的病痛，但即使对其它方面皆感满意的妇女都提到了这个问题，并经常拿她们在 50 年代的青年时期与当前的病痛作比较。蒋秋娃（2001 年的访谈）说道，不是这疼了就是那搭疼了，没有个自然会，一天，哎，看这人一生这一辈子就没有说是平平安安地过过去。这有一问题，是？不是这个就是那个，老了有老人那难，你说是？做年轻忙忙碌碌，盼娃大了，怕娃不得大，zhen 大了，你闲下来，我看都不胜做年轻，做年轻那地里那活干上，戏唱上，歌唱上，那几年，到地里高兴的，哎呀锄地了就唱开戏了，那啥的，向天看上个秦腔戏，这都爽了几天。nie 到 zhen 了年轻大了，好呀呀，今这了明那了过得没意思。

节提供种子和短期贷款。20 世纪 50 年代，妇女参与到了雄心勃勃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尝试当中。许多新的行为做法的出现创造了国家效果，产生并重现了区分国家和社会的模糊地带，这个模糊地带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新排列了农村的空间和时间以及农村妇女的生活。然而，仔细考察这种乐观的进步叙事就会发现其活泼欢快的表述中还包含了其他主题，这些主题中的每一个都至关重要、矛盾、并带有社会性别指向。

第一个主题关系到国家对土地所有制的政策问题。“生活两次变得更好”并不是一个无止境进步的故事，而是一个有两个节点的进步故事，它们对农民产生的效果都惊人地相似：50 年代的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家庭，80 年代的改革开放将土地包产到户。在这两种情况中，家庭都是最基本的生产单位。集体化不再出现在这个进步的版本中。

土地分配的两个时期（50 年代和 80 年代）并非完全相同，甚至在记忆中也不完全一样。妇女们的故事很明确地表明，第一个时期的物质水平极度不稳定。她们确实提到了互助组，虽然不喜欢、但也赞成初级生产合作社，并认为这两种安排都改进了她们的日常生活。但集体化初期带来的这些好处却不足以弥补“大跃进”那些年的混乱以及随之而来的物质萧条。这些农村妇女乐观的进步叙事中并没有着重提到那些年。

相反，当她们概括最重要的变革时刻时，她们获得土地的两个时刻突显出来。第一次土地分配标示着政治混乱（共同的记忆）和家庭脆弱性（个体的、亦通常是痛苦的记忆）的结束。它终结了一个生命阶段（童年或青年时期，取决于她们的年龄），开启了一种乐观发展的视野。叙述土地革命时，妇女既往后看也向前看。在描述第二次土地分配时，她们则只往前看。我们的受访者没有将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开放说成是终结了一段糟糕的插曲。⁶相反，她们把改革开放说成是一个可以更容易获得物质产品的时刻。例如，通过将她们结婚时收到的衣物和家用品件数同她们的女儿、儿媳或孙女们结婚时收到的进行对比，她们具体地道出了这种变化。B 村的王西芹回忆，她在 40 年代末结婚的时候，我结婚时娘家缝 1 个被子，这边家缝 1 个被子，他爸出去拿 1 个，屋里就剩 1 个被子，这么我连他爸要五、六床被子，我媳妇要十几个被子呢，老早能比？⁷王西芹认为这些物质上的改善跟妇女地位的提高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么拿钱

⁶ 虽然她们有时也对与当下的劳动形成对照的集体劳动进行抱怨。当我们问何改珍（1999 年的访谈）哪段时期她最高兴时，她答道：嗯，那就是……那个土地分到户。

高小贤：以后？

何改珍：噢，以后。

高小贤：当积极分子那一段？

何改珍：噢，噢。嗯，不是，土地整个分到户，这高兴，噢。

高小贤：责任制之后。

何改珍：噢，好。嗯，这又不到农业社做活，在自己家里干活，我想早起早起，想迟迟起。往日在那在那那搞修梯田，妈（注：叹词），给你，你谁去迟，人家给你，给你那插黑旗的呀，噢，白旗黑旗？

⁷ 与王西芹的访谈，1996 年。

拿回来，咱就能用，老早人家把钱拿回来，你敢随便用，我屋是我当家呢。以前轮不上你……这么咱在屋说话算数呢，就连给亲戚行礼，咱说送啥就送啥，都由咱呢，老早你敢，我娘家亲戚过生日，我蒸了几个馍，我大都给我撇了，就还不准我出门去。⁸ 这样的描述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妇女生儿育女并且变老之后，她们在家庭中的权威提高了，但此处儿媳地位的普遍提高也很重要。⁹

进步叙事中的第二个主题涉及到一些跟土地所有制没有直接关联、但妇女们理解为对她们有益的 50 年代的特征：婚姻法，扫盲课，盗匪的清除，可以参加会议、唱戏和跟除了近亲以外的人交往。对她们当中的很多人来说，50 年代初期开拓了她们的社交世界，在各方面对随后的几十年有巨大的反响，激励她们在革命的光芒消散很久之后担任起责任重大的职位。对有些妇女而言，70 年代初输卵管结扎的出现和她们子女在 60、70 年代获得教育的可能性的增加，是她们讲述令人欣慰、充满了成就感或满足感的故事里的重点。她们的故事带有社会性别的特征和指向，因为对男人来说这些进步的措施既没什么戏剧性，也没什么突出特点。

这种关于无止境的进步的叙述也包含了旧的伤害。景军对甘肃省大川村孔氏家族进行了精雕细琢的民族志研究，并在其 1996 年出版的《神堂记忆：一个中国乡村的历史、权力与道德》一书中提醒我们，后毛泽东时代中国记忆的国家政治牵涉到对“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悲惨记忆，而这些悲惨的记忆还未得到全面的认可。他写道，“在地方上，对过去的苦难的记忆也总是被压抑着，唯恐它们会揭开旧伤疤，威胁到当前社会关系的既有秩序。”¹⁰ 虽然本书的农村妇女们所经历的并非“大跃进”最严重的饥荒，但那却是一个极为困难的时期。文化大革命对城市地区的影响比对农村地区的更持久，但关中和陕南的许多村庄却直接受到了政治斗争、批斗地方干部和暴力的影响。¹¹ 妇女干部和劳动模范也未能幸免。在曹竹香的村子里，文化大革命见证了当地村民与由于水库工程而被迁移进来的外来移民之间的冲突。竹香的徒弟周桂珍和另一个村里的干部，再次受到了水库移民的攻击。竹香自己也受到一些最终被证明为子虚乌有的指控，说她曾逼得村里一个男人自杀：他要说老婆把那逼的跳井了。老婆在大队气得当时就吐血了。¹² 张秋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当作反革命扣押了起来，据她自己讲述，是周恩来亲自出面把她放了出来。¹³

尽管集中激烈的文革活动在农村地区持续时间不长，却对妇女如何理解文革之前的社会主义初期产生了影响。文化大革命增强了她们对在 50 年代所获

⁸ 同上。

⁹ 有关这一事实，见阎云翔 2003 年：第 180 页。

¹⁰ 景军 1996 年：第 168 页。阿敏（Amin）（1995 年：第 118 页）指出，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使产生一种独立于官方说法的叙事十分困难（他指的是 1922 年乔里乔拉村的暴动）：“下属群体也产生他们自己的记忆，但并非任由自己的喜好去产生这些记忆……我搜集的农民的叙述必然在不同程度上被霸权的宏大叙事玷污、损害和着色。”

¹¹ 渭南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6 年：第 318-23 页简要叙述了渭南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¹² 与周桂珍的访谈，2006 年。

¹³ 与张秋香的访谈，1996 年。

得的成就和认可的依恋之情。她们重述 50 年代的故事以避免那些文革时期投向她们的指责，并继续在改革开放时期讲述这些故事，作为对那些（通常早已去世）曾经攻击过她们的人的回应。T 村的李六斤记得自己受到的伤害和激愤之情：我这辛辛苦苦了十几年啦，我这问心都没的愧呀！给我栽了些啥呢，栽了些黑话，你说狗日的。人家给我栽的是：我把我娃儿抱到说的“汽车走的嘟嘟嘟，喔里头坐的大肥猪”。噢，我侮辱了汽车里坐的这些人。就给你编的事情。所以把我就想不通这些事情！记得是抽稗子那个时候，七月份，我们到田里抽稗子，叫回来，给做了个尖尖帽，嘿，高的很，一米多高，扶到给我戴到脑壳上。哎呀！当地我那时呀，尖尖帽一戴，心里感到难受，我坐到我们北沟坎上，我说我一攒头钻到水里去死了，回心一想，我那六二年一个，六四年一个，两个小的，人家 li bian（故意）斩草除根，我这一死两个娃儿（也）完了，我说只要留我这一条生命，我也慢慢的活。所以我二话没说呀，我就这么家哭。我口里没说，我辛辛苦苦从五几年干了这些年程，没的白天黑夜，上头布置任务，下头坚决完成，哪怕是黑了的会，回来说了都要一个个给传达，我都这么辛苦，给我戴个尖尖帽，我都想不通！我都哭，二话没说。

结果还有一路几个嘛，一直把我游到夏家庵，又到周家坪。我的侄娃在商店，出来一看，哎呀咋是我么姑？——一下钻进去都哭了，我一直回来都没张腔，尖尖帽一搁哟，我睡到床上去，我说我辛辛苦苦干了这么多年，没一点下场，最后干到巴巴一，把妇女干部都给取消了，我那时当时下的决心（是）啥？我说，我不但在共产党手里干啦，我的儿子，孙子都不叫干啦，没的个啥下场！这六六年过了到六七年至六九年歇了这么三年。

六九呢，来了个“放下包袱，开动机器”这么个政策，把你有冤屈叫“放包袱”，包袱放下“开机器”。哭了一晌午，我就把我的冤枉，苦处哭了一晌午，说了以后，轻松了一些。运动毕了叫我当妇女主任，“不当”再说我都不当，最后把我的档案材料翻开，照着我的材料才填表，又给我报上去叫我当妇女主任，又给我做工作，从六九年又当妇女干部，六九年当到七三年，七三年县上下来整组，整组毕了把我选成副支书。一直当了八四年。

这就对了嘛！不能说就认这个人那个性，个性要服从党性呢，还让党性来服从你个性咋得行呢？以国家的大事为要紧啦，所以这最后就又好好给人家干嘛。¹⁴

对著名劳模山秀珍而言，她在文革时历经的艰辛促使她披露了一段隐秘而不为人知的家族史，这段历史并未在 50 年代初的土地改革时期被提及。1966

¹⁴ 与李六斤的访谈，1997 年。

年的一天，她发现自己在土改时期被分配的阶级标签——下中农——遭到了质疑。突然间她作为一个革命妇女领导的所有过往都遭到了批判：把咱这妇女也给的咋（注：欺凌），妇女可怜的，黑了十冬腊月抱的娃不给我写些大字报，那么在学校就不能出来，我就嫌那姐妹太可怜啦，抱上娃，雪下的噢。

从你们来的路上，席子铺了几十张，到处都贴的大字报，从路上到我家门上，都贴满了，就差没给我身上贴。说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让我进大队的门。一天叫我到地里劳动哩，你是历史不清，你是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嘛（大字报说自己的）。说你是反革命嘛！你是历史不清，是逃网地主呢。

一天都能把人封了（指：大字报特多），我看那大字报多的，这也太失现了，大字报上说我在旧社会美国人还到我屋里来过，唉，我说那旧社会我又不是蒋介石总统么，美国跑到我屋里弄啥来啦，大字报上说的。我看那不行，我不找我那婆家的历史不行啦。

我就问我这儿有 90 多岁的一个老汉叫个老万盛，刘万盛，我说：“叔叔，你给我说我爹在哪儿，我董家到底还有谁嘛，这大字报说我是漏网地主，说我在礼泉是漏网地主逃到这儿来的，我说我给地主干过活，我不是地主。”我说这大字报我不反对，那是马列主义嘛，马列主义的一张大字报嘛，我说你不怕啥，你给我说，我都不敢到学老师跟前去。

这下我万盛叔问我：“这娃你问这些做啥哩嘛。”我说那我不知道，我回来也感到奇怪，我这儿连一个筷子碗都没有，咋还有八亩半地，咋来的嘛，那地现在还是一等地，我婆的娘家老舅种着哩。他说：“那是你爷的命价，我爷给刘家做到过年了（注：做活），欠你爷两串麻麻钱，你爷给人家要钱哩，人家不给，把你爷打了一顿，你爷着气了就上到南厦子（指：老屋）顶弄了些洋烟一喝就死到那儿了。

唉呀，我这下刀子把心扎的才更劲大了（注：厉害），我想我这人老几辈咱这么可怜呢（哭），旧社会一个个都咋叫把命夺去啦，唉，唉呀，我心里心（注：更）难受啦，他说：“那是你爷的命价”，后来那旧社会有那乡约，给你做活哩，做到过年还有老婆有娃哩，你不给他钱，你竟把他打的让他死了，不行他，他把我爷给埋啦，把我爷一埋，那地就是我娘婆两家子爷的命价。

我这下把我那人老几辈历史弄清了，我买了几张大张白纸晚上悄悄到学校让宋老师给我写，我让广大群众，贫下中农把我也识别识别我到底是个啥人，

是逃网地主呢还是人老几辈在旧社会把命短了。大字报出了后也没有人说啥，也没有人反对。¹⁵

甚至在山秀珍被彻底正名之前，她还是带领妇女们去收割庄稼，而此时男人们则跑去干文化大革命去了。当年的把两个主要干部打倒了，剩下会计张玉生和我，我俩人一商量，队上男人都跑到潼关搞打、砸、抢去了，¹⁶我就给妇女开会，说咱们不敢跟着走，咱们还有 1 千多人口呢，还有老人，娃娃呢，庄稼收不下了，要饿肚子呢，妇女好的很，大家就收了麦，锄头地，管棉花，我说咱争口气，把庄稼种好，结果 66 年、67 年我大队庄稼还是大丰收，口粮还高。¹⁷

这样的故事提醒我们，我们从口头叙述中所了解到的一切不单单以时间的推移为标记，还以随后发生的事件为标记。这些事件影响了妇女们如何回顾她们早年的领导岁月。李六斤和山秀珍，先遭到蔑视、随后被平反，又开始担负起领导的职责，在某种程度上支撑她们的是 50 年代积极活动那些年所形成的自我意识。或许她们也知道并没有其他选择：即便有些社员反对攻击她们，她们的各种关系和利益仍然由她们所在的集体决定。

农村妇女们所叙述的单一的“向前进”的故事本身充满了省略，这些简省之处在故事的细节中重新显现出来。然而故事的情节却是向前的。今天的中国农村最能发现毛时代痕迹的或许是无处不在的“进步”主题。¹⁸农村的人们将集体化和改革开放都看成是党和国家所取得的成就，尽管他们也提到了一些具体的细节，如个人的失望之情，未达成的愿望以及当代生活的痛楚。我们访谈的那些当过干部的妇女依然关心国家进步的问题。她们担心党在地方上的活动会减少，妇女工作得不到重视。¹⁹山秀珍为社会秩序的衰落和公共安全的下降而深感忧虑，她还担忧一个新发掘的金矿给潼关县带来了财富的同时也带来

¹⁵ 与山秀珍的访谈，1997 年。

¹⁶ “打、砸、抢”是文革常用语。

¹⁷ 与山秀珍的访谈，1997 年。

¹⁸ 对进步的期望是何时并如何根植于广大农村妇女心中的？这一问题十分有趣，尤其是考虑到第九章提出的“时间的皱褶”现象，然而我们无法解答这个问题。

¹⁹ 一个曾任队长的妇女对改革时期妇联地方工作的减少表示失望：村上不重视，乡上还是不重视。过去有个啥哦，不管有啥人来了，叫男的知道，还叫女的知道。现在，女的都不提。在七十年代以前，妇女工作搞的都好。现在村上莫得妇女干部。我莫干以后，选了另外一个。我问过她，和这认后开会处理个啥？她说做个啥，你那个时候还能帮助解决问题哩，还能给人办事，做个啥。那这就，就不叫你去了，就不叫妇女去了。那个时候是啥，有点啥，不通过妇女，要执行啥我莫叫你就敢。他弄啥还要来寻我。她还说，这种情况似乎是政治活动普遍缺乏的部分体现；60 年代，党支部每两周或每个月都会开一次会，而从 1999 年夏季开始，党支部一整年都没有开过会，村里的某个领导还派了一个非党员去收党费。她对这种做法表示反对，说她无钱可交（与鲁玉莲的访谈，1999 年）。

越来越严重的毒品问题。²⁰ 党和国家早已不再需要她们效劳，但她们依旧描述国家在她们村庄里产生的效应，尽管国家 / 社会的分界不再通过她们或她们贡献了自己政治生命的组织（妇联、生产队）而产生。

虽然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愿景如今实际上已被抛弃，但它的印迹却依然留在女劳模们的记忆里，留在农民们讲述的故事中，留在她们现在视为理所当然的、对生活的期许中。正是这些期许——物质生活水平会提高，机会会越来越多——激发了改革开放的热情和支持。当改革在某些地方出现停滞、差错，或者产生腐败和地方暴政时，这些期许也可能是导致近来发生激烈的农民抗争的原因。²¹

核心家庭的风靡和对老人的排斥

党和国家的高层在 80 年代所首肯的现代性新设想加速了早在集体化时期就已经开始的农村家庭变革。当集体化在 50 年代废除土地的继承权时，它也开始逐渐破坏之前那种年迈父母跟已婚儿子在一个多代同堂的家庭一起居住的做法。常规的做法变成了，年轻的夫妻只在头几个孩子出生前跟夫家人住在一起，之后便分开住。²² 第七章已表明，很多老人都为不跟一大群孙子孙女们同住一个屋檐下而高兴，因为这样就不需要照顾他们和给他们提供经济上的帮助。

20 世纪末，激进的政治运动在陕西农村基本上成了历史。50 年代那一代身强体壮的年轻妇女们曾参加过批斗地主大会，跳过秧歌，领导过妇女生产小组。半个世纪后，她们的女儿和孙女们则分别前往西安、沿海县市甚至国外去寻求就业机会。²³ 一个女人自主选择丈夫也不再引起争议。童养媳、包办婚姻、长期屈从于专制的婆婆的做法也不再是定式。仍然住在农村的夫妻们通常一结婚或结婚不久之后便组建了他们自己的家庭。物质产品的丰富和收入的普遍上涨也免去了夜晚做针线活和扬谷的必要。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核心家庭作为一种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延迟了的现代性的表现进入公众的讨论。家庭空间曾经被忽视，现在则到处被颂扬。它作为消费和情感贮存的场所，出现在政府的著述、新兴的社会科学和流行的话语当中。它也成了经济生产和创造财富的合法场所，国家经常发起的宣扬发家致富的运动即是明证。家庭成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高唱实现全民富裕的梦想的地方之一。虽说家庭被誉为是私人的领域，然而它却对公众的梦想至关重要。²⁴

虽然“家庭”现在被认为是私人的领域，但是“私人的”却不局限于家庭空间。²⁵ 改革开放时期，“私人的”获得了新的含义，使用的范围从国家认

²⁰ 与山秀珍的访谈，1997 年。

²¹ 欧博文（O'Brien）和李连江 2006 年对近来中国农村抗争的介绍很有用。

²² 阎云翔 2003 年。

²³ 1999 年，Z 村一共有 16 个行政村所混合组成，4,231 户家庭的总人口为 17,000 人。村里壮劳力的总数为 6,783 人，差不多有一半是妇女。一千余户家庭从事刺绣出口活动，我们看见大街小巷的妇女都在用钩针编织东西。未算入壮劳力的 2,800 余人都离开村子到外地工作去了，其中三成为女子且大多未婚。村里的领导告诉我们，妇女的农活担子要比男人的重（Z 村简报，1999 年）。

²⁴ 有关民国时期对“小家庭”的讨论，见葛淑娴（Glosser）2003 年。

²⁵ 阎云翔（2003 年）对改革时期中国农村的这些问题的介绍引人入胜。

可的私营企业延伸到新兴的流行文化中对个人私隐的情感生活的提倡。在城市里，公共的展现亲密和私隐的新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电话热线和卡拉 OK 厅，正重新定义个人的私生活；农村舞厅和新兴的县城里娱乐场所的激增也表明农村的私生活也可能会遭到类似的重新定义。许多有关当代中国的著述都将私人

和家庭领域视为是两种被压抑的“自然”欲望的回归：一方面要走向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则要成为无情世界里的一个避风港。²⁶

然而，革命的一个辛辣的讽刺是，年老的妇女们曾在家庭不被公众关注的那些年维持了家庭的运转，而现在家庭领域的重构却是通过排斥和惩处她们的方式得以实现。有些妇女身陷困厄的境地。她们曾尽心尽职地照顾丈夫的双亲，而现在自己变老后却被自己的成年已婚子女抛弃。吸引她们子女的是一种新型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的中心是敛财的、野心勃勃的、消费的家庭单位。这些成年子女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压力，面临着周遭的繁荣将永远无法惠及他们的可能。

有些老年妇女对儿子们有诸多抱怨，有的儿子不赡养她们或拒绝跟她们说话，有的儿子的老婆不让儿子给她们粮食，有的儿子打骂父母，有的儿子偶尔被她们告上法庭。她们描述了当下各种痛苦和困难的境况。她们讲述自己的模范行为并认为自己胜过后代的妇女们，T 村的李六斤就说道：哎呀，那当乎那些女的，从艰苦日子过过来的，知道个盐米贵贱呢。这当乎这些女的，我就笑，就是个二十多岁呀，二、三十岁这些子，这正是在蜂蜜罐罐里头，七几年生的这些子，都不知道个瞎好，都没过过艰苦日子，这当乎这些女的都还好，下不下苦，就是喔。²⁷ B 村的庄小霞强烈谴责了年轻女性的衣着和行为：那才不一样，现在这吃饭，穿衣服、花钱，干啥都和我不一样，那看不惯，穿裙子，凉鞋，皮鞋，烫头，潇洒太太，媳妇，女子都是和我还是不一样？²⁸ 她们尤其为年轻女子的性行为而苦恼。看不惯有些胡来的，自己男人好好的离了婚，看上那年龄大的有钱，我可想跟，咱看不惯。²⁹

她们虽然总体上对年轻女子进行了谴责，却并没有抱怨自己的女儿。女儿通常都外嫁，父母也不期待她们提供赡养，但她们却在物质上很慷慨，跟她们母亲的关系也更融洽，从而挫败了世世代代对儿子的偏爱。³⁰ 康汝清愉快地说，大女儿给得我的零花钱，给我穿衣服，冬天夏天，人家都给我照管。³¹ 钱桃花说，要不是这些女子，人家光给你们些粮吃，我们这些女子，来就给你割肉呀，买营养品呀，副食呀，纺线呀，不是这些女子钱还紧张的很，她们知道

²⁶ 关于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各种各样的欲望，见罗丽莎 1999 年，2007 年。

²⁷ 与李六斤的访谈，1997 年。

²⁸ 与庄小霞的访谈，1996 年。

²⁹ 与周桂珍的访谈，1996 年。

³⁰ 关于这一点，见石瑞 (Stafford) 2000 年：第 110-26 页；阎云翔 2003 年：第 178-82 页。

³¹ 与康汝清的访谈，1997 年。

你还受了些罪，爱戴呀，都是人家给买。³² 她们既惊叹于女儿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为之感到骄傲，并一直提起她们自己年轻的时候。康汝清说道，你看过去，我们受得啥辛苦，我们过去都是草房，小娃穿都穿不上，说哪走出门去了，赶紧洗了，下了雨了赶紧拿火烤一下，烘一下，缝个衣把还没钱缝啊，赶到赶到缝个衣服，赶紧编个筐么呀，背到去卖了，赶紧去给娃儿子扯个衣服，哪有啥。现在这都是，大女儿住的是楼房，屋里空去，各方面条件都挺好，铺地毯，地板砖。屋里叫的是小商店。³³

一些妇女对女儿和儿子都感到自豪，子女成年后的行为也印证了她们在教育方式上的成功。李六斤说道，女子都是照我学出来的，一个个都能干的很！特别是烟厂里我啵女子，处人处事，对人，屋里外头，又会操心，安排，谁个都——那当乎教书，走到那个学校里，老师，学生都爱，教书呢，对学生教的也好，也认真，说个笑话言子，学生见了对她也好，这些老师们都对她好。所以我的这些娃儿女子出来都能干呀，都是那当乎管教的，都能干，走到谁家屋里都是啵，我到我啵亲家屋里去，哪个对我不尊敬？³⁴

作为老一辈的过来人，妇女们突出表达了她们在对待儿媳上的自豪感。何改珍说，我媳妇进门，我没有给她考个啥。我一早起来把外道一扫，把屋里一扫，还把她房一扫，她把门给我留着哩。我烧水，端的放在她桌子上，饭做好了喊她起来吃。媳妇咋，女子咋，[都一样]。她们也回忆起曾如何教自己的女儿成为好媳妇：这女子一到人家家我就下压着在：不准让老的生气，能做了啥你就做。³⁵

然而，在这些比较圆满的故事之外，还有一些故事充斥着对儿子儿媳的怨恨和不满，因为他们不理解、珍惜或者回馈妇女们过去作出的牺牲。中国农村婚礼的费用逐渐增多。孩子在 80 年代或之后结婚的妇女们举债去置办布匹、日用织品、衣服以及其它一些娶亲必备的家庭用品。婚礼花费昂贵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婚礼仪式简单的 50 年代倒成了例外。但结婚这项不成文的社会契约的另一半要求，即父母为儿子娶妻并在年老后得到儿子儿媳赡养这一要求，却减弱了，在那些没有从改革开放中致富的家庭里更是如此。在这些情况下，儿媳就算不被描述成罪魁祸首，也被说成是挑起摩擦和争端的根源。

当我们让肖改叶将她自己当儿媳时的经历与她儿媳们的经历进行比较时，她径自挪用并改变了一个旧的有关政治解放的用语，提出了“翻身翻的太厉害了”的说法，而这句话在翻身一词的原语境中可能意思说不通：现在人翻身了么，我那时还没翻起来么，还没翻起来，怕害羞，不敢惹老人害怕把老人惹气

³² 与钱桃花的访谈，1997 年。

³³ 与康汝清的访谈，1997 年。

³⁴ 与李六斤的访谈，1997 年。

³⁵ 与何改珍的访谈，1999 年。

着了，现在这媳妇想她当家料事，小伙子是副手。我那时把丈夫敬的不得了，老人是一层天呢，对我怎么样，我反正到屋里把你叫妈叫爸，你对他好不好，我给你做媳妇，你当老人，你活那么大年纪。现在怕怕了，翻身翻的太过分了。翻的不养活老人了。

大地方没有，我到山西过黄河那边，到西安，成都，西安我都跑遍了。大地方都好，不要紧，就是我这山区，妇女翻身翻的太厉害了……噢，他媳妇不叫养活老人，娃子不敢犟，弄的人家的日子过不成，人都说给我了我吃，不给了就算了，咱为了咱这老的，使得人家两口子三捶四打吵架有啥意思。我这人是直杠杠，什么是家丑不可外扬，属实嘛，我心里有啥就直说，有些人都不说家里的情况，我活了60多了，我是直直子，我给你说。³⁶

“翻身翻的太厉害了”与加入革命集体形成对立；它意味着个人行为自私，只关心自己的小家庭，不管不顾年迈的公婆。妇女们在此叙述集体化时期时，她们仍然是用家常的语言讲述她们的困难。她们不认为国家对妇女的双重负担负有直接的责任，也没有在描述“大跃进”之后的饥荒时直接说出这一点；同样，在说到改革时期的艰辛时，她们对集体提供的最低保障如何被废除，从而导致农村家庭面临越来越大的经济压力这些问题谈得也不多。相反，她们塑造了一种错综复杂的叙事，在这种叙事中，她们过去的苦难同她们“吃苦”、胜任工作以及举止合乎道德的能力紧密相联。这种叙述的力量一方面来源于革命时期“诉苦”的做法，另一方面来源于苦难的母亲这一古老得多的文化比喻。相比之下，当代的年轻人却饫甘餍肥、娇生惯养甚至冷酷无情。马丽评论道，咱那时做媳妇尊敬老人，现在尊敬谁哩，比老婆子还厉害。那时当媳妇回来了喂狸，洗锅，做浆水，做鞋，屋里大的，小的，老的，少的都得给做。现在这媳妇忙的，这忙的吃了饭出去玩去了，玩下午了回来做的一吃，到傍晚把娃引上又玩去了。³⁷

康汝清滔滔不绝地给我们讲了一个这样今昔对比的故事，故事一直从当下（1997）回溯到“大跃进”饥荒。我们村上，这企业，人家大部分都把房修的，屋里沙发罗，这些冰箱罗，这些，条件。过去见过这些东西吧？谁见过冰箱是个啥？沙发是个啥？谁见过？这，六一年，我们都是吃，买的个红萝卜。青菜，两手钱一斤，我们搞副业，就是外头下了雨了，农业社里外头，田坝里莫活了，编一点雨帽，就是下雨戴的这个斗篷，编点雨帽，一个雨帽才买人家一斤红萝卜，那日子，全家人一天吃一斤谷子，一斤谷子才半斤米，还是烂谷子，你去吃么，看谁现在过这日子，红苕叶子我们吃过，洋芋叶子我们吃过，胡豆叶我们吃过，胡豆毛角角我们吃过，这红苕杆么我们还推了，连萝卜笋了，

³⁶ 与肖改叶的访谈，1999年。

³⁷ 与马丽的访谈，1999年。

踏些面子，这吃糊糊都跟到，还不如现在这猪的饲料，煮糊糊，吃得这大人娃娃都拉不下来。

都过的那日子，六几年，现在这社会，你看这，白米细面，还这样不好吃，那样不好吃，都这，那些人都还是条件高的是不得了，我把我们那个时候过的日子，他们见都莫见过。

1964年，三十四岁的汝清成了寡妇，独自抚养四个孩子，并一直拒绝改嫁。她两个儿子向她保证说老了会照顾她，但汝清跟两个儿媳的关系却不好。小儿媳妇说是：“为啥我们养活她？”说的我。小儿子说：“她赶我们干的活多，她在屋里又要干家务事，她要养猪，都是养鸡。”都说：“那一家养一年”，我们小儿媳妇的人家叫提出，一家一年，跟到大儿子一年，最后，我们女儿连和娘家妈，你另过叫他们给你拿粮，最后，八一年我都另过到的。儿子们基本不养她，1984年她便离开村里到外面给别人做饭和当保姆，十年后身体渐渐吃不消的时候才又回到村里。

当汝清在1997年说起自己一辈子的辛劳工作时，她的叙述在集体化时期和当下之间来回展开，并轮番对儿子和儿媳们进行了激烈的指责，但他们都不在现场。这计划生育，都是好的很，我们大儿子说：“你养我一个，看你吃啥穿啥我都给你，你养我们这几姊妹，几弟兄，都是，都害怕吃了亏了。”他都不能给你，你烧一点柴，他也不愿意，他说他吃了亏了，都要分平，分平，儿子给，媳妇不让给，不让给我也不要，我这个人好说话。

过去哪台都是，田里有水呀，都去，都是你妇女去，去干活，五八年就是，田坝里做一天，回来，在食堂里留饭。人对了给你留点稠的，人不对了，面上给你点稀的，你回去弄些野菜，才调到锅里，烧呀吃，我们大娃所以说书没念出来，没有吃的，饿的都是没啥吃，书念出来做啥？饿都饿坏了，我们过去都是，少吃无穿，穿都穿不上。

我们结大媳妇，客都待不起，炒的随便菜，现在你看，都在现在还在递我的二话，说是，结她的时候，席都办不起，那是普遍的，都没有吃的，都没有谁家富裕，农业社里分粮人家给你分下来你才得吃，不给你分下，你吃的都没的。

有的说，没本事，你妈算个有本事，全大队还属人家有本事，老子活到五八年有病，还有养活个病人，还要养这些都是仔娃儿女，人家没本事？白天干活，白天外头干活，晚上搞副业，挣几个盐钱，弄几个盐钱，都是没本事，没本事都是草房人家挖抓到，一年养些猪，猪不吃肉，不杀到吃肉，人家卖了还修瓦房哩，瓦房修了在你们手里头又修楼房，也帮助你们是，给你们干活，

还算人家有本事，一个女流之辈把这些小娃盘大都能够了，还给你们媳妇结了，都把媳妇结了，女儿启发了，这孙子啥都给你们盘大，这人家还是有本事的，没本事，你们手里做了一下还有丈夫还有，都给你们劳动，人家一个女的家，人家这么多年把小孩盘大，都算有本事的。

现在这媳妇是打颠倒的，婆婆娘是媳妇，媳妇是婆婆娘，你给人家干活，人家现在媳妇都不能给干活，她连衣服都还不给你洗一件，你有时间了给她娃洗，给她大人洗，她都不能给你洗一件，那我这个人，我也不说谁个，我也不咋。你有活儿叫我给你干我就干，我也不多说话，往年子我多在外少在家，我也没啥做，你只要有我吃的碗饭都对了，我也不争强，你给我了来我就要，你不给我了来我也不要你的。³⁸

即使儿子是有过失的那一方，但他们所在的地区都会认为儿媳才可能解决忽视老年人的问题。1996年，我们第一次见刘凤琴时，她的丈夫还在世。四个儿子都已结婚并分了家。她帮他们带三个孙子。她和丈夫种着一小块地，种的粮食够他们自己吃。她的儿子们不帮她种地，女儿和女婿倒是有时来搭把手。她和丈夫准备好了棺材放在屋里。她对我们说，如果可以重来的话，她会只生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要个儿子是因为儿子不会嫁出去，会一直在同一个村里。³⁹

当我们在十年后的2006年再次见到她时，她已经80岁了，眼睛因白内障几近失明，医生说已不能动手术。她丈夫刚刚过世。当她离了婚的三儿子在外干活时，她大部分时间都在一张凌乱的床上度过，必要时则摸索着走到外屋或偶尔坐到门口跟路过的人闲聊。这个三儿子早上给她带些蒸馍，偶尔晚上做饭。她的女儿们都嫁到了其它村子，各有自己的孩子和责任。她们每隔几天带些食物过来，帮她整理屋子，清洗衣裳。但她其余三个儿子，其中两个就住在附近，却完全不管她。这么留下我一个人，没人管，都没人管。⁴⁰

我们问她的邻居有什么解决方法，他们都认为刘凤琴的处境十分糟糕，却表示爱莫能助。B村的村民们向我们解释说，当地的习俗是老人跟一个孩子（如果有的话）住，老人只是那个孩子的责任，其余的孩子不负任何责任。大儿子是个鳏夫——也就是说，根本没有儿媳——因此不能照顾她。二儿子跟一

³⁸ 与康汝清的访谈，1997年。但康坚持说是她自己要一个人另过，也就是说，维持自己家作为一个独立经济单位的状态：我另过的原因我都感觉到，生活自由、撇脱一点、他们吃干饭，我要吃点稀饭、他们吃的饭硬一点，我要吃软活一点、我都另过了这都十七年了。还是我娘家妈活到，都叫我单另过，儿女，跟到青年人过到一起，你一年添一岁，人家又爱吃个烘熬烘炒，你见到你一年添一岁，牙不行了，都是你跟到人家过的到一起吧。

³⁹ 与刘凤琴的访谈，1996年。康汝清（1997年访谈）更为直接，说两个儿子以上的话会产生矛盾：你跟到老大，他说你把啥给老二了，你跟老二，你说你把啥给老大了。

⁴⁰ 与刘凤琴的访谈，1996年。

位女干部结了婚，邻居们认为可以找她去说明情况。跟她住在一起的三儿子离了婚，因此也没有妻子可以照顾凤琴。四儿子可能因为一场财产纠纷的缘故，不跟她说话。总之，村民们认为问题的根源是缺乏尽责的儿媳去亲手照顾凤琴，而不是她儿子不够多。照顾老年人的安排很明显没有跟上一结婚便分家这种新做法的节奏。⁴¹

在讲述当前的困难时，农村妇女们呼唤过去。她们说集体化时期形势严峻，需要她们付出牺牲和经受苦难。她们自豪地说起自己的品质：苦干的能力，积极分子的热情，管理难相处的人的能力，公正。她们接着说起当前的种种问题，身体日益衰弱，却没有从那些她们曾经付出最大心血照顾的孩子身上获得应有的回报。妇女们注意到了改革开放的中国物质水平极大提高这一事实，并将这个事实同年轻一代的个人和道德的失败联系在一起。她们的故事有时并不怎么协调地在进步叙事和叙述个人伤痛（我们能干、品德高尚但却常被误解；我们遭到批评和指责；我们的孩子享用了我们一辈子辛勤劳动的果实却不理解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我们的孩子不管我们）之间交替进行。进步叙事为她们的美德和苦干赋予了社会意义。当这些妇女们对她们的生命作总结陈述时，却很少提及那些充满具体细节的伤痛，叙述伤痛仅为她们有美德却不被赏识这一事实提供了些许安慰。这些叙述记录了家庭如何突然成为新冲突而不是亲密和消费的场所。

婚姻已经在各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都是 50 年代的秧歌积极分子们所憧憬和希冀的。但婚姻仍然对家庭财产有很大的影响——甚至影响更为深刻，因为改革开放已使家庭变成了经济活动的主要场所。一个令人悲伤的讽刺是，有时那些已经老去的前积极分子们却被她们要分家单独住的孩子们丢到了一边——这正是这些积极分子们在年轻时推行婚姻改革带来的远期结果。

何改珍就发现自己在 80 年代就处于这样一种情况中。1982 年，改革开放准许农民离开自己的家乡，改珍的儿子便打算去新疆当合同工人。当时，改珍的丈夫刚去世不久。儿子将改珍、妻子和两个儿子留在了家里。家中的主要

⁴¹ 这种令人唏嘘的情况在关中平原很普遍。我们在 Z 村采访了一个有 5 个儿子的妇女。依照安排，第一个和第五个儿子负责赡养她 and 为她送终，因为第二、三个儿子已赡养和埋葬了她十年前过世的丈夫。五儿子只供给她粮食。每个儿子都说愿意一个月给她 5 块钱，但没人真正给过。她靠着在集市上卖东西勉力维生，打算到了卖不动时就追着向儿子们要钱。她讲述自己故事的时候禁不住泪水涟涟。据她说，这种问题是同改革一起产生的（1999 年与胡腊月的访谈；亦见 1999 年与肖改叶的访谈）。乡党委书记告诉我们，子女虐待老人的情况在山区更为严重，因为那些地方周围没有邻居会说你家里的闲话。

在 G 村，退休的干部和工人返回村子后组建了“老年协会”，提出每年的 9 月 9 日为“敬老日”。他们颁发“好媳妇”、“好婆婆”和“好孝子”等奖项，每年探望老人两次，并赞助了一个定期举行的敬老集以方便老人买东西。协会有个四点计划：

（1）9 月 9 日全家吃团圆饭；（2）要有一次家庭圆桌讨论；（3）老年人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自己设一项任务；（4）子女需为父母做一件事。类似的社区协会是否会在其他地方出现或在解决农村老人需要方面取得进展，还需拭目以待。

有关中国其他地区养老问题的讨论，见郭于华 2001 年；阎云翔 2003 年：第 162-89 页；叶敬忠、何聪志 2008 年；叶敬忠、吴惠芳 2007 年。怀默霆（Whyte）认为，改革时期中国城市子女对父母的抚养义务感增强了。有关新农村建设环境中湖北和河南的老年人组织，见王习明 2009 年。有关中国城市和农村的老年妇女问题，见贾云竹 2007 年；黄鹂 2007 年。

劳动力走了之后，改珍应儿子的要求去已故丈夫在河南的亲戚那里借钱，用七拼八凑来的钱做起了小生意。当她发现儿子每月从新疆给他妻子汇款以增加储蓄、而不是帮她还清家里欠下的债时，她深感伤心。改珍懊悔自己识字——她是罕有的在1949年前上过四年学的人——因此能看懂儿子在信上说了什么。我说，我最不识字，不看他那些信，我还不知道，我还不是都过啦。噢，把这些信一看，我说，娃子（注：儿子），咋样儿？那，那你咋弄？你给你媳妇捎下钱，叫你媳妇花，把数字点好花，用不了的钱啦，叫存下。你说，看你这挺着。你说，你打比（注：如果）你当老人，你心里难受不难受，嗯？你在屋都知道我莫得钱，叫我下河南背二百多块钱，你给你妻子邮的钱。我把这一回想，我说，人家娃子（就：孩子）心都瞎了吗。

改珍似乎无法跟一个阴沉着脸、帮着不孝顺的儿子聚敛钱财的儿媳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她接受了一个鳏夫的提亲，但她搬去跟他和他的子女们住之后，却遭到了他的儿子们的强烈反对。回去人家娃不愿意噢，不愿意就那别别扭扭，顿顿饭给那娃子解释，说哩噢。就那号（注：那样）回来，解释解释些。后来回来，后来些，我牙痛咧，那呀，那就怪，确定那就牙把我痛啞（注：痛的厉害）啦呀。牙痛是火么，一黑啦（注：一整夜）没有瞌睡。睡不差，白日不想吃饭。噢，有一顿端，吃半碗，有一顿吃一碗儿，有一顿还不端碗。这就做不了啥，就没有身体。

尽管房子是自己的，改珍还是觉得不能回去跟儿媳一起住。她搬去跟一个亲戚住到了一起。她的新丈夫仍住在他自己家里，无法忍受子女的责骂。我就在街道住着在。人家老汉人（注：老头儿）来说屋里总是嘴碎啦哩（注：嘴多）。老汉儿来就抗抗颤颤（注：发抖，颤抖）。老汉说不断个抖，把鞋脱了，脱了睡炉上。那，老汉就这号（注：这样）说：老牛犁地刀尖死。都说，那有啥意思哎，“老牛”：等于他这老人养活儿子，养活一辈子。这牛老啦，噢，这刀尖就把你捅（注：宰）了嘛，就不要你了嘛。老年犁地刀尖死嘛。骨头……肉吃啦，骨头还卖成钱啦么，牛肉吃啦，牛肉骨头都卖成钱哩么。就那几个解不开（注：理解不了），懂不下。然后就没有回来，就在那合作医疗。盖下的那棚棚，叫病人来，治病哩罗，做饭啥，就，就钻到那屋里，给上吊啦。

噢，就是为啥，就是儿子不愿意，在屋里总是嚷仗（注：发生口角）啦嘛，吵嘴啦嘛。我睡到这街道不知道么。过去，连老汉儿死，埋那一天才一百天。

何改珍最后还是回去跟儿媳一起住，她儿子也从新疆回来了。她觉得自己有权这么做因为这是自己娘家的村子，她第一个丈夫是招赘进来的，房子是她自己建的。但是，是法院命令她儿子儿媳把她领回家的。先到公社，这是给

调解的噢。说叫等一会儿工夫，把人给叫去，人家看我在那儿坐，就爬起来跑啦。跑啦，最后人家那儿，乡上说，那咋样的，我给调解咧。他牛气（注：傲气）咋样的。看你在那儿坐，就跑啦。我俩上法庭，说理哩么。后来，到法庭，坐到桌子上，那法庭庭长把那衣裳都穿上，帽子戴上（她可能将当时的场景同从电视上看到的一部历史剧的有关细节弄混了；80年代地方上的法官并不穿袍子和戴帽子），说：大林，你往你妈跟前坐。庭长就给他准备啦，说，他大林要是不接受我，不认我，不认骨肉，说是，给他做个瓦样子（注：以法处置）哩，做个娃样子，给他这青年人做个瓦样子，不赡养老人，给做个心样子，叫以后那些人看看。说是，你把你妈今晌引回去。这啥就不说啦。你要是不赡养你妈，再说。这他就爬起来走啦。庭长说。跟上子后（注：屁股后）一路儿，我回来啦。我媳妇在墙门根听墙根儿（注：偷听谈话）。把女子抱上，媳妇站那儿。回去。

媳妇睡啦六天啊。睡了六天，我做六天饭。她也不上锅啦么。她不吃。我到小商店，给买水果吃。有哩么，噢，就是嘛，我还不见怪（注：生气）。就那就好啦，那过过她就好啦么。[我的邻居]前儿（注：前天）他娃子还打他咧。我娃子（注：儿子）可没打过我。我娃子还没骂过我。就是这咱人老啦，嫌你说话不行。我在屋我就不说话。我连他不多说话，有啥话说咧，没有话我就不说。惹他讨厌做啥。⁴²

这除了是个充满了痛苦细节的故事之外，还是一个更大的有关老年妇女、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珊珊来迟的山区老年妇女的故事。改珍和邻居们的儿子都已届中年，年长于那些可以去往沿海或内陆城市寻求工作的年轻人。由于经济上的压力，成年的儿子对母亲（大多守寡）都态度恶劣，与此同时儿媳则尽力聚敛资源为她们自己的小家庭打算。何改珍的情况比较特别，由于她第一任丈夫是招赘进来的，房子属于她娘家的财产，所以她愿意夺回住在那里的权利。虽然跟儿子儿媳相处困难，她却并没有对旧式的婚姻表示怀恋，也未质疑过自己年轻时行动激进的意义。相反，她多年的激进行为——再加上房子一直属于她、而非属于儿子的父系那边这一事实——给了她一种权利意识和闹上法庭的愤慨之情。但她也很明白地说道，尽管离婚姻法保证可以自主选择结婚伴侣已经过去几十年，曹竹香选择守节守寡、拒绝再嫁也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情，老年人再婚却依旧充满争议。⁴³

⁴² 与何改珍的访谈，1999年。

⁴³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34、35条特别规定了要保障丧偶妇女继承财产的权利：“丧偶妇女有权处分继承的财产，任何人不得干涉……丧偶妇女对公、婆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公、婆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其继承权不受子女代位继承的影响”（即公婆子女的继承权；<http://www.china.org.cn/english/government/207405.htm>）。

高小贤：都是，看你儿子和媳妇都是自由恋爱的。那为啥，这个，老年人再婚，一般儿子都反对？

何改珍：噢，反对哩么，说到老后面，这么才给宣传哩，叫说是给……说是，老人呀，可以，噢，找对象。噢，找老伴，往日，不兴么，娃子就闹狠啦么。

高小贤：那，你再没有想给自己找一个伴？

何改珍：我没有，以后再没想，我跟，我回到我屋，我再没有心想啦，我一心一间，照顾孙子，照顾孙女儿。⁴⁴

在革命承诺给妇女平等的那些年，由于家庭领域从革命的视野中消失，她们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如今革命不再，她们也年事已高，即使家庭领域再次回归为展示现代亲密性的场所，她们也同样不大可能得到什么救助。何改珍为农村的老年妇女们发声，对当下和未来作了简明扼要的评价，并在叙述中频繁地使用“可怜”一词。我打草鞋么。前年合作社，收那柿子，旋柿饼，我那年旋柿子饼都挣啦，挣三毛钱就够一百块哩，你当。你看，我花这钱，我给我买洗衣粉，买牙膏。嗯，这磨包谷（注：玉米）就磨这玉米，这我给掏钱。到压面机，我去压面我给掏钱。在一块儿吃么，我不提出问他要钱。那油、盐、酱、醋，那他管。那时候打草鞋钱多啦，我还给管咧，卖钱时候了，我就给啦。一天打两双鞋。一双鞋，那个，把袋子都抽的现成的。这，这后头，这双鞋这叫青绳，把这都搓的现成的。掏钱买下的。那你到我屋去，你看我那床底下都搁的是那。到河里去洗，用洗衣粉洗，洗得白白地，你弄得漂亮些么，你弄得黑吧，不是没人要，洗得白白地……老早一双卖五块哟。你说那咋样的。娃子，农民么，娃子挣不来钱么，你咋伸手问娃子要。

农村这儿么，人老啦可怜。你搞（注：挣）不来钱，你就坑着咧呀！你像我还要吸烟，不要买烟，还要……都是自己挣钱。我还能干么，我不做咋地，咱一家人咋办？做不动啦，那没方儿（注：没办法）啦么。⁴⁵

遗憾的是，尽管农村的经济生活已再次发生剧烈转变，50年代那代妇女也早已过了生育的年龄，夜间干农活和针线活的那些年也逐渐远去，“可怜”依然是农村妇女们在评价自己生命时持续使用的一个词。她们使用这个词的原因已经变了。她们的青年时期是在一个赤贫和危险的社会中度过的。她们将自己的工作生涯，无论愿意与否，都给予了一套曾无休止地从她们身上榨取劳动和精力的社会安排。这套社会安排现在却遭到了批判。这些妇女当中许多都没有从她们的子女身上获得从前家庭所提供的那种支持。何改珍也发现不可能在晚年获得她在50年代所高唱的婚姻自由；新丈夫的子女们，以及持反对意见的

⁴⁴与何改珍的访谈，1999年。

⁴⁵同上。庞丽华、布劳（Brau）和罗思高（Rozelle）2004年探究了老年人继续参加正式和非正式劳动的问题及其与居住方式和养老保障下降之间的紧密联系。

村民们都异口同声地阻止这桩婚姻。“可怜”描述的不再是一种从遥远、抽象的社会力量中被动受苦的状态。如今妇女们用“可怜”一词描述的是，在一个孝道已经发生变化的环境中，她们晚年的烦恼。

诉苦仍是农村妇女熟悉的一种模式，我们听到的每个故事都带有诉苦的痕迹。从压迫到解放的诉苦轨迹并没有详细论及这些故事呈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难以实现的革命承诺。与此同时，“我们践行了美德但我们的后代却没有”这种去革命化的说法虽然出现在很多故事中，却通常与一种看法同时存在，这种看法认为当今的女性拥有这许多年老的讲述者们无法奢想的物质产品和机会。两个故事（“现在的妇女处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但她们的不如从前的我们”）结合到一起更加表明了社会性别的安排遵循的不是一条从封建的过去到梦寐以求的后社会主义未来的线性的道路。

留给我们的是一种更为缓和适度的看法，我们要将社会性别看作是嵌套在一个不断变化的语境中的、依具体情形而定的实践和理解。在特别的时刻，如革命的时刻，社会性别的某些意义被剥离了。但大多数情况下，社会性别的意义逐渐增长并缓慢发生变化。这些故事里有许多元素对故事讲述者们的祖母来说都不会陌生。可以肯定的是，对自己辛勤劳动和巧妙维持家计的自豪感，以及在“我很可怜”这句话中体现出来的十足的委屈和不满，应和了女德中令人尊敬的元素。但展开那些故事的世界已加入了践行女德的新场所，与此同时还打压并清除了曾构成践行女德的核心的一些习俗。虽然在这些故事中，忠于母家的情形依然十分显著，但恪守贞洁已不再是故事的主要关注点。然而，能当好干部或能为集体劳动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都已变成了记忆中的美德行为的一部分。

有关中国 20 世纪革命中的妇女的学术研究聚焦的不再是党和国家的政策对妇女是好还是坏这一最初的关注点。⁴⁶ 这一问题虽然重要，但却不够，除此之外，我们可以开始考察在明晰的政策内外，革命具备社会性别特征和指向的所有种种体现：革命对空间的重组，与非革命时间的关系，产生的具体的国家效应甚至对社会主义累积的策略，都具有社会性别指向。

这样的重新考量可能会迫使我们关于中国革命的一些常识性假设进行修正。党和国家断言，革命将妇女解放出来，使她们从“内部”领域转向“外部”领域——后者是工作有报酬、政治公开和可获得解放的重要地方。这一说法值得重新审视。当“内部”领域的劳动无法在国家提供的关于解放的话语中得到表达——残余的、乏味的、将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消失——妇女日常生活的大部分都消失不见了，甚至她们自己都无法表述出来，只是在夜间针线活上才会用有关美德的语言来形容自己。然而，副业的消失、孩子的出现及养活他们的需要、大家庭的缓慢解体都使家庭时间的内容在集体化时期发生剧烈变化。妇女生活中家庭时间和运动时间之纠缠表明，官方关于政治变革——一半的农村人口都历经了这种变革——的说法从根本上来讲是不完整的。

如果我们不关注社会性别，就无法理解中国革命。但是社会性别并不能完全解释单个的个人，更不用说一个集体。我们需要将社会性别放到一系列的权力关系中去理解。所有这些妇女的故事中深刻的代际烙印、她们对后来的妇

⁴⁶ 有关这种研究范围拓宽的具体表现，可见贺萧 2004 年，2007 年之三。

女既担忧又认可的矛盾态度提醒我们，社会性别不只是唯一的有用的分析范畴，而且社会性别与其它范畴的交叉重叠必然会使其自身分化。“妇女”、甚至“农村妇女”这一范畴皆受到年龄和地域变化的深刻影响，每一种变化都有一系列自己的附属、规范和越界——所有这些都同时在当代的中国流通传播。这些有关个人历史的社会性别叙述本身在发生变化，并对这些叙述被言说出来的当下时刻提出要求。

对历史学家来说，这些故事为中国农村在关键时期的转型提供了更为全面的报道。这份报道既起到丰富的作用也起到颠覆的作用，不但有充满感性的细节和强烈的情感色彩，还提供了新的主题和论点。这些故事表明，毛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最近的改革时期经济空前发展的基础，都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农村妇女未得到认可的劳动。当她们坚持认为她们所记忆的具有美好德行的自我并未随时间而改变，**这些老年妇女在面对国家的反复无常和家庭的忽略时创造出了一种历史的连贯性。**她们叙述了一个充满艰难困苦的世界，为我们指明了那些尚未被认出和言说的顽固的不平等。在精心塑造记忆的自我的过程中，她们从过去搜寻有用的故事，有力讲述了当前的伤痛和两难的困境。

妇女们的故事告诉我们，在远离中央机构的地方，对那些处境并未完全得到党和国家的策划者和空想家们理解或重视的人而言，社会主义在地方上是什么？产生这些故事的世界已经消逝，能够听到叙述者们诉说的机会也在慢慢消失。老年农村妇女们、她们的故事和她们的记忆是否能够成为具有韧性的集体记忆的一部分，这点尚不清楚。⁴⁷ 农村妇女们讲述的记忆扩展了我们作为听众对一个消失了的过去的认识。这些记忆也应该对构建一个有价值的当下的伦理和政治至关重要。

⁴⁷ 保罗·康纳顿（1989年：第3页）在其《社会如何记忆》一书中写道，“跨越不同的世代，不同系列的记忆通常通过隐晦的背景故事的形式与彼此相遇；这样一来，不同辈分的人虽然以身共处某一特定场合，但他们很可能在精神和感情上依然保持绝缘，在某种程度上，一代人的记忆便不可挽回地锁闭在了那代人的身体和大脑中。”关于记忆在代际之间的传递，见王斯福（Feuchtwang）（2000年：第65页）和贝尔托（Bertaux）和汤普森（Thompson）1993年的文章。